

乡情乡韵

灞桥“演义”

张建安

我生于西安北郊、渭河北岸、白蟒原下的十里村，少年时期，学会骑行后，便常常往返于西安城与十里村之间。出入古城，灞桥是必经之地，岁岁来去，朝夕路渡。彼时只视灞桥为寻常路桥、沿途风物，从未深究这座古桥沉淀的历史人文底蕴。半生漂泊，阅世读史，今居北京，回望秦川，方知一桥横灞水，半部长安史。

自古长安雄踞关中，凭山河形胜立帝都基业，最负盛名者便是“八水绕长安”。渭、泾、沣、涝、泾、漓、灞八水环绕腹地，滋润秦川、涵养帝都，成就千年古都的雄浑气象。

八水之中，灞水尤具诗情，临水而立的灞桥，更是长安文脉的点睛之笔。古长安八景流传千古，“灞桥垂柳”位列其中，区别于华山之险、终南之幽、曲江之雅，独以依依柳色、悠悠别情，成为古都温润入心的人文印记。

灞桥存世2000余年，历经初建、损毁、重修、拓新，是国内建桥史、修缮史、人文史最完整的古桥之一。其始建于春秋秦穆公时期，穆公改滋水为灞水，就地筑木梁桥，初为关东官道要津，形制质朴，却扼守长安东郊门户，为后世千年咽喉要道奠定根基。

汉室定都长安，灞桥战略价值陡增，成为拱卫京师的第一道屏障。文景年间，朝廷数次加固桥体，拓宽官道，适配军政商旅通行。秦末楚汉争霸，刘邦屯兵灞上，凭灞水天险、灞桥要道安定关中，开启大汉基业。

至汉一代，灞桥多承铁血戍守之责，军旅出征、粮草转运、边关屯守，皆由此渡。亦自汉起，灞桥捭阖成俗，仕子远游、官吏出京、信使出关，皆于此辞别，开启了后世折柳寄情的文化源流。

隋代立都大兴，着力规整京畿交通。开皇二年，朝廷大修灞桥，弃旧朽木构，垒石为基、铺木为

面，拓宽桥身、规整规制，升级为国家级官道枢纽。隋祚虽短，却彻底革新新灞桥形制，为盛唐风华积淀了坚实的建筑根基。

及至大唐，长安万邦来朝，灞桥褪去兵戈肃气，化作第一送别胜地，灞桥垂柳的景致与人文意蕴臻于鼎盛。唐人尚情惜别，因“柳”谐“留”音，柳枝柔韧常青，遂成寄思挽留之物，“灞桥折柳”也成为举国承袭的风雅习俗。凡远行之人，皆于此折柳赠别，十里长堤载尽人间聚散、天涯离愁。

盛唐诗坛群星璀璨，文人墨客驻足灞桥，临水抒怀，题咏不绝，诸多名句流传至今。李白《灞陵行送别》诗云：“春风知别苦，不道柳条青。”春风尚惜离别，不忍催绿柳丝，写出了世间的温柔怅惘。温庭筠过此感怀：“灞桥杨柳，千里关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”道尽羁旅漂泊、山水相隔的人生憾意。李商隐凭桥叹岁序更迭：“阶前青苔老，灞水送流年。”以流水匆匆喻光阴倏忽，沉郁悠远。岑参边塞归乡，触景生情：“桥边杨柳，归客鬓已尘。”新柳年年如故，游子半生风霜，新旧对照，尽是沧桑。

唐神龙、开元年间，朝廷两度大修灞桥，加固桥墩、铺砌桥面、补植堤柳，十里灞堤风光鼎盛，成为长安城外标志性的风雅胜地。

唐末战乱频仍，长安凋敝，灞桥屡遭兵祸，桥体残破，昔日盛景不复。

北宋初年，官府重修古桥，改木构为通体石拱，桥体坚固耐久，适配长期通行。宋代文人多怀家国忧思、羁旅乡愁，灞桥更多化作世人凭栏怀古、寄托心绪的静谧之所。

元代战乱不休，古桥疏于修缮，历经风雨碾磨，斑驳残旧，默默见证王朝兴废、山河浮沉。

明清两代重视关中风物与古道，灞桥迎来多次

修缮与续建，有史可查的大小修缮、重建工程共7次。明洪武年间全面重建，规整桥洞、夯实桥墩，恢复通行宏制；嘉靖、万历年间两度修补桥石、整治堤岸。清代修缮更为精细，康熙、乾隆、道光年间5次动工，乾隆朝更是改扩建为多孔石拱大桥，工艺精湛、形制恢弘。

明清文士途经此地，多登临怀古，追慕汉唐雄风，感叹山河依旧、世事变迁，为古桥再添人文厚度。

民国时期，交通迭代，千年古桥难以适配现代车流，逐渐退出主干道之列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新建现代化灞河大桥。自此，新旧两桥隔河相望、各司其职。老灞桥不再承车马喧嚣，经文物部门保护性修缮后，成为承载千年文脉的古迹遗存。古桥存史，新桥便民，古今共生，绵延不绝。

灞桥是桥，更不止于桥。它是跨越两千年的活态古迹，留存着朝代更迭的印记，刻录着关中文明的年轮。它是八水长安的地理坐标，是长安八景的风雅名片，一河一桥一柳，定格了古都独有的山水气韵。它是唐诗宋词滋养的文脉丰碑，千年诗词沉淀于此，让一座冰冷古建，承载起中华绵长的离别诗意与人文温柔。

于我而言，它更是根植骨血的故土乡愁。白蟒原的风物，渭水畔的烟火、少年骑行的光景，尽数凝于这座古桥。岁月流转，灞水东流不息，堤柳岁岁常青，古桥静默如初。它阅尽秦汉雄风、盛唐风华、宋元风雨、明清烟火、今世新颜，承载山河形胜、千年文脉、人间悲欢，安放无数游子的故园情思。

灞桥演义，演的是山河更迭、文脉绵延，是人世聚散、岁月沧桑。古桥不语，岁月有声，秦川不老，乡愁永续。

古道“徽”煌

王熙炯

山水相映，灵秀天成。更有“七彩玉谷”静卧群山之间，溪水澄澈，卵石斑斓，流光溢彩。山间常年云雾翻涌，群山因云而生幽，流云因山而生情，缥缈似仙境，故而得名“仙人寓所”。这里既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秘境，亦是三县百姓守望相依、往来交融的纽带。

如今，保存完好的古道全长7.5公里，由每块长1.5米、宽0.6米、厚0.2米的石板铺就，共有2.1万级台阶，层层叠叠，蜿蜒山间。古道沿途留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遗迹：启源亭、古稀亭、继保亭、玉泉亭、玉泉井、杜梁桥、输山碑……如同一部部翻开的古籍，镌刻着厚重绵长的文化记忆。

相传八仙之一的铁拐李途经古徽道，见挑夫长途跋涉，个个汗流浹背、口干舌燥，心生恻隐，以拐杖杵地，清泉汩汩而出，于是便有了这口玉泉井。古稀亭的碑记，亦娓娓道来一段温情故事：一对年逾七旬的夫妇，子孙满堂、乐享天伦，见古道行人风尘劳碌，便捐资建亭，供路人歇脚避雨，世人感其善行，于道光二年勒碑铭记。这份古道热肠，在山间

流传百年。清道光八年的输山碑，更写下古人护路护山的约定：“自岭头至岭脚，凡崎岖之处，不论公私，永远抛荒；平坦处，挨路上输三大、下输二丈，永禁开挖。”这份世代相传的公益担当、奉献精神与敬畏自然的环保理念，今日依然彰显价值。

古道之上，雄峙着一座石长城关隘——桦根关，它扼守古道咽喉，地势险要，居高临下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《清史稿》记载此处战事达数十起，曾国藩“屡败屡战”的典故便源于此地。如今硝烟散尽，石长城残垣断壁，关隘野草丛生，见证着岁月变迁，让人回想当年的金戈铁马。

时光流转，如今古徽道已卸去交通要道的职能，转变为热门的文旅打卡地。漫步古徽道，脚下的石板带着千年的湿润，耳畔的风声藏着商旅的低语，山间清泉流淌着岁月回响，碑刻亭台沉淀着文脉悠长。每走一步，仿佛都在与历史对话。

千年古道，“徽”煌依旧，它蕴藏着山水之美，也镌刻着人文之暖，在时光中静静流淌，等待更多人读懂它的故事。

岁月如歌

灯下漫笔

在皖南腹地石台大山深处，隐藏着一条千年古徽道。它始建于唐代，坐落于池州石台县、东至县与黄山祁门县三县交界的仙寓山上。历经岁月磨洗，石板路上留存着昔日商旅的足迹，也蕴藏着山山水水的灵秀与厚重。

这条古道古称“徽饶通衢”，曾是连接江西上饶，继而衔接浙江与福建的商贸要道，更是从池州通往徽州并辐射浙、闽的交通咽喉，当地人亦唤它“池徽大路”。自唐代起，这里便成为徽商往来的通道和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，商旅的铃铎声与戍卒的脚步声在山间回荡。2013年5月，它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承载着古徽道文脉底蕴的仙寓山，素有“西黄山”之美誉，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这里峰峦叠翠，森林覆盖率超过90%，高浓度负氧离子氲氙山间，造就一座天然氧吧。常绿阔叶林、落叶阔叶林与针叶林交错共生，红豆杉、三兴杉、鹅掌楸等珍稀树木郁郁葱葱，山豹、黑熊、短尾猴等野生动物在林间溪畔自在栖居。寻常草木亦藏山野生机，

灯下漫笔

《东坡在人间》指瑕

王钦刚

近日阅读阿来先生的非虚构作品《东坡在人间》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6年2月第1版），受益匪浅。同时也发现其中有一些史实错漏之处，现罗列如下，供相关方及读者参考。

第009页：“南宋一则笔记中说……笔记《侯嬴录》……”其中说《侯嬴录》是“南宋”笔记不准确。《侯嬴录》的作者赵令晄（1064—1134）曾是苏轼的同僚，主要生活在北宋，卒于南宋初年。《侯嬴录》一般称为“宋人笔记”。

第011页：“桃柳庵，那才是他读书的地方，为传世而为《书》《易》《论语》作传的地方。”此说不甚准确。据苏轼《黄州上文游公书》：“到黄州，无所用心，辄复覃思于《易》《论语》，端居深念，若有所得，遂因先子之学，作《易传》九卷。又自以意作《论语说》五卷。”苏东坡作《易传》和《论语说》最初是在黄州，不在儋州桃柳庵。

第024页：“宋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十九岁的弟弟苏辙同中进士……”苏辙十九岁是虚岁，则苏轼应为二十二岁（虚岁，生于十二月）。

第028页：“在成都府任上就发现欣赏苏氏三父子才情的张方平……”其中“成都府任上”不准确，成都当时为益州，张方平时任益州知州。

第032—033页：“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……而清醒的老臣如欧阳修却明白那是好大喜功，徒费周章，自然坚决反对：‘谓开河如放火，与其劳人，不如勿开。’”此处有误，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，不可能在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发声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此处是宋神宗引用欧阳修的话，是欧阳修“尝谓”（曾经说）。参见《宋史》卷九十二志第四十五：“帝曰：‘果尔，甚善……’故欧阳修尝谓开河如放火，不开如失火，与其劳人，不如勿开。”

第054页：“他二十七岁时，新科进士，刚服完母丧，三父子一起回朝。”此处“二十七岁”有误，服完母丧丧回朝时，他是二十四岁（按旧历虚岁计）或二十二岁（按公历周岁计）。

第054页：“一晃三十几年时光，有志青年变为一皓首老翁……”其中“三十几年”有误。从前文讲到的服完母丧丧回朝（1059年）到北归（1100年），已超过四十年。

第062页：“此时距苏氏兄弟最后一次回乡，已经四十多年。”其中“四十多年”有误。“此时”（1097年），距苏氏兄弟最后一次回乡（父丧，1066年至1069年）三十年左右。

第074页：“虞应龙是南宋名相，曾在采石矶大败金兵虞允文的孙子。”此句不通。虞允文是南宋名相，曾在采石矶大败金兵，虞应龙是其孙。此句应为：虞应龙是曾在采石矶大败金兵的南宋名相虞允文的孙子。

第076页：“沈括和东坡交集较早，宋神宗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沈括被朝廷派到江浙去巡察农田水利和新法施行的情况……至于李定、舒亶之辈寻章摘句，上奏朝廷，将苏轼拘押审问，最后流贬黄州，已是四年之后的事了。”其中“四年之后”有误。苏轼被捕受审是在1079年，被贬黄州是在1080年，距离1073年已过六七年。

第142页：“北宋时，大庾岭北，是南安军州。”第147页：“南安军州之学，是因一任知州叫曹登……”其中“南安军州”应为“南安军”，“知州”应为“知军”。在北宋，“军”是与“州”平级的行政区划单位，如苏东坡贬谪海南的“昌化军”（曾为儋州）。

第171页：“他父亲辞世，已三十七年了。”此时（1101年），距离他父亲辞世（1066年）应为“三十五年”。

第183页：“他一生，历任凤翔府、开封府、登州、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、颍州、扬州、定州……”其中“登州”的顺序有误。按照先后顺序（历任），“登州”应在“湖州”和“颍州”之间。

第204—205页：“暑热起时，他终于到了隔长江可以相望常州的真州，今江苏仪征，那时写作仪真。”常州不在长江之畔，无法和真州（仪真）隔长江相望，与真州隔长江可以相望的应是润州（今镇江）。

第205页：“又找另一个远一点的亲戚，黄师是。前面说过，这个人是章惇的亲侄子……”这个人（黄师是）应是章惇的外甥。参见《宋史》卷三百五十四《黄宪传》（黄宪，字师是）：“绍圣党祸起，宪以章惇甥故获免，然亦不得久于朝著焉。”

第209页：“而这个附近正是苏轼当年被抓走的那个湖州。正在京口附近。”京口即润州（今镇江），湖州、镇江两地并不毗邻。

人在旅途

云南哈尼梯田的水光倒影间，偶遇天然如龙的自然幻境，成就“见龙在田”的影像与题咏；非洲草原孤树下临场挥毫，直面旷野生灵，写下“与天地对话”……自2019年至今，作家莫言与书法家王振结伴而行，以山河为卷、步履为笔，开启长达7年的跨界壮游与艺术创作。80万里行路，无数朝夕晨昏的所见所思，最终凝练成诗文、书法、影像，沉淀为独属于二人的“知行合一，文墨共生”的艺术轨迹。

眼下，这段文墨交织的壮游积淀，以一场展览的形式集中呈现。“乐观——莫言&王振与十八罗汉”特展日前在北京举办，集中呈现两人七载结伴壮游、文墨共生的创作成果，诠释了当代文人行走山河、笔墨寄情的精神风骨。展览现场，莫言、王振深入揭晓这场“老友记”背后的故事。

脚步走到哪里，艺术的灵感便追随到哪里，二人的远行，多是随心而动的艺术奔赴。莫言说：“去哪个地方，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心血来潮。”这份随性，恰恰是创作的珍贵初心。一次，偶然看到当年毛泽东同志与东阿县委书记谈及鱼山曹植墓的史料，他当即邀约王振踏足此地。一趟鱼山之行，溯源魏晋文脉，归来后，二人潜心品读曹植诗文，手写《洛神赋》，将实地寻访转化为创作素材，完成一场跨越古今的文脉对话。

脚下路过的故土山河，不止勾联记忆，更为艺术创作注入厚重的精神底蕴。河北易县石门村是莫言当年从军的地方，时隔数十年重访，昔日的营房早已荒废，断壁残垣之间，曾经的宿舍只剩斑驳墙壁，无人居住的老屋中树木肆意生长、高耸参天。旧地重游，沧桑感扑面而来，莫言感慨：“像这样一些地方，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青春岁月，同时也产生一种清晰对比的沧桑感。这也是诗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感情模式。”山河变迁、岁月沉淀的厚重情绪，成为二人诗文真挚的内核。对湘西、南京等地的深入探访，也不断为他们的创作积淀人文底色。

行走之中，常有意外之喜撞开创作之门。云南哈尼梯田之行，便是一段奇遇。哈尼梯田是王振惦记了20年的营房早已荒废，断壁残垣之间，曾经的宿舍只剩斑驳墙壁，无人居住的老屋中树木肆意生长、高耸参天。旧地重游，沧桑感扑面而来，莫言感慨：“像这样一些地方，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青春岁月，同时也产生一种清晰对比的沧桑感。这也是诗人特别喜欢的

一种感情模式。”山河变迁、岁月沉淀的厚重情绪，成为二人诗文真挚的内核。对湘西、南京等地的深入探访，也不断为他们的创作积淀人文底色。极端的自然环境，逼出了极致的创作状态。有一年元旦期间，黑龙江抚远东极气温低至零下38摄氏度。为防止墨汁冻结，二人将墨汁烧开，加盐装入保温杯，以笔墨“新曦”迎接华夏第一缕朝阳。严寒之中，指尖僵硬，落款时已难以运笔。这场极寒中的书写，成为7年间最难忘的创作记忆之一。

从脚下国土到异域远方，行走的半径不断扩大，创作的视野也不断打开。2025年，他们奔赴俄罗斯贝加尔湖、库页岛、海参崴等地。这场远行缘起数十年前的阅读初心：莫言在军艺求学时便熟读拉斯普京的《活着，但是要记住》，书中描绘的贝加尔湖让他念念不忘；契诃夫的《萨哈林旅行记》也让库页岛成为他心中多年的远方。“就是因为这两本书，让我对这个地方一直特别感兴趣。后来终于在去年去了，看到了我们想象中的很多东西，也看到了想象不出来的一些东西。”莫言说。

在俄罗斯，二人循着文学巨匠足迹实地探访。走访肖洛霍夫各处旧居，驻足静静流淌的顿河畔，触摸《静静的顿河》笔下的山河肌理；走访陀思



韵律如歌 莫言 撰

以步履写山河：

莫言与王振的七年壮游

张婷

受耶夫斯基博物馆，景致与《白夜》《白痴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的文字一一对应。莫言说，作家故居的价值正在于“让读者去这个地方，然后跟他读过的小说产生一种对应，由此展开更加感性化的想象，回头再来读这本书，感觉大不一样”。实景溯源，以行悟文，成为二人海外艺术实践的鲜明特色。

二人也在异域街巷与历史现场淬炼笔墨的从容。在埃及百年咖啡馆，二人落座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福兹的专属席位即兴创作；日本闹市席间，众目睽睽之下从容提笔，练就笃定的创作心态。莫言笑言：“这样一种现场书写，也锻炼你的脸皮，今后再在什么场合下写字也不会发憊了，拿起笔来就写。”

将目光投向自然，旷野中也藏着深层的生存智慧与创作启示。7年来，二人累计拍摄数十万张独家影像。在非洲草原，与金钱豹近在咫尺，看猛兽淡然观世，读懂生灵的松弛与野性；蹲守河畔数日，见证角马、斑马迁徙的犹豫与奔赴，目睹其与潜伏浅滩的鳄鱼的生存博弈。莫言从中感悟：“只有成群结队地下去，当每只鳄鱼嘴里都叼着动物的时候，后边的才能过去。带头的总是要作出牺牲，但是没有带头的，大家都过不去。”

步履不停，笔下便不枯竭。80万里的持续行走，沉淀出丰厚的文艺成果。依托一路见闻与实景感悟，莫言创作了千篇文章、300余首诗词，《东瀛长歌行》《鲸海红叶歌》《黄河游》等长篇诗作应运而生。其中，《东瀛长歌行》一夜成文，字字凝练，成为系列创作中的标志性作品。王振全程同行，双方持续交流艺术观点，在结伴游历过程中共同精进。他们还将旅途见闻与创作持续分享给公众，常年保持广泛的影响力，收获众多读者。莫言坦言：“本次展览的核心作品，即是我们文墨共生理念最成熟、最完整的代表作，未来我们还要继续行走下去。”

更难得的是，这份始于步履的艺术实践并未止于笔墨。二人以公益践行初心，让行走生发的善意，助力数千名先天病患儿童与孤独症儿童。行路创作，由此不止有文艺高度，更有人文温度。

7年间，莫言与王振以步履丈量天地，以文墨记录山河，让创作扎根大地、源于生活。这场跨越山海的文艺同行，是二人知行合一的艺术修行，也是当代文人传承壮游情怀、续写文墨风华的生动写照。